



◎ 李骏 著

浙江县报百年来

钱法成题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李 骏 著

浙江县报百年史

钱法成题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浙江县报百年史 / 李骏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308-09800-7

I. ①浙… II. ①李…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浙江省 IV. ①G219.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4844 号

浙江县报百年史

李 骏 著

责任编辑 叶 抒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00-7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对于县报,我有一种亲近感,原因有二:一,我是从基层走上新闻岗位的,可以说县市报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我写的第一篇新闻处女作《合众布厂职工制订爱国公约》,就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宁波一家报纸发表的。二,我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岗位上,深切感到县报在推动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为“萧山日报获奖作品集”写的序《时代进步的镜子》中,就专门作了阐述。今天,看到《浙江县报百年史》,自然产生情感,也愿意为此写几句话。

《浙江县报百年史》用翔实的材料向人们介绍,在经济发达、人文底蕴深厚的吴越大地,百年前就有了县报,可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密切关系。一个县的经济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县报的创办)提供了条件,而精神文明的提升(县报功能的发挥)又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内以较多的篇幅记载了我省县报几个发展高潮,特别是 1992 年春天,在邓小平南方考察讲话的鼓舞下,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县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1993 年全省新增县报 10 家,增量超过了历史存量的总和达到 18 家,1994 年春,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台州、衢州、丽水等地区陆续实现了县县有党报,到 1998 年 10 月,全省县市党报增加到 58 家。事实证明,县报之所以有如此发展的潜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县域经济实力的驱动,是县域媒体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所在区域的信息需求。

《浙江县报百年史》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提升自身品质,在创新中发展。2003 年,国家出版总署针对一些地方报刊散滥的情况,提出对全国报刊进行整顿,其中对县报整改力度最大,我省共有 40 家公开和内部的县市报停办。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2004 年,原来停办的《建德日报》率先办起新闻网站,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内部刊物《今日建德》,逐步探索出一个县域新闻媒体发展的模式。很快,这种模式被许多当年停刊的县报所采纳,到 2005 年,类似《今日××》(包括《×县新闻》)的县报发展到 50 多家,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态势,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以内刊形式的《今日××》县报的出现,适应了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展示了新闻工作者创新精神的可贵!

《浙江县报百年史》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县报在发展中造就了一大批新闻人才。办报之道在于树人。1998年省记协县报工作委员会成立，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培训县报的记者、编辑，每年都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请领导、专家讲课，由县报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让大家明确：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如何做一个有责任心的新闻人。正因为办报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仅从报纸质量来看，以往，县报新闻奖获奖的记录在省、全国是零，如今，不仅能在省新闻奖中获得一等奖，而且在中国新闻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绍兴县报》的连续报道《“特殊党费”交纳第一人》和《萧山日报》副刊“夜航船”上发表的《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一文都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浙江县报百年史》的出版，应该古为今用，让大家在学史中，紧密联系当今实际，获得一些为今所用的启迪。

江 坪

2012年初春于杭州知不足斋

绪 论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到抗战前夕的浙江县域报纸(1897—1937)	23
第一节 戊戌维新到五四前的浙江县域报纸	23
第二节 五四时期到大革命失败时的县域报纸	30
第三节 四一二事变后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县域报纸	42
第四节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县域报纸	49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县域报纸(1937—1945)	57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在县域出版的上级报纸	58
第二节 由县域报纸转化而来的上级报纸	64
第三节 抗战时期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军队办的报纸	68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报纸	74
第五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县域报纸	79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县报个案	84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江县域报纸(1945—1949)	95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官办与民营县域报纸	95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报纸	103
第四章 浙江县级党报发展的第一个高潮(1949—1979)	110
第一节 解放后初创的县级报纸	110
第二节 浙江省委推动的第一个县级办报高潮	119
第三节 增期扩版与改刊为日报的热潮	124
第四节 记者的培养	131
第五节 通讯员队伍的建设	140

第六节	县级党报对推动基层工作的积极作用	146
第七节	“文革”前后的浙江县报	152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县报(1980—1991)	154
第一节	“为农民群众办一件好事”	154
第二节	浙江省率先复刊的县报	157
第三节	八十年代创办的其他县报	166
第四节	县级农业科技报的涌现	171
第五节	县级经济报崭露头角	178
第六章	浙江县级党报发展的第二个高潮(1992—1999)	185
第一节	县级党报复刊和农科报、经济报的改刊	185
第二节	探索适宜县域需求的办报路子	193
第三节	县报报业的初步发展	204
第四节	县报发展中的考验和挫折	211
第五节	县级党报的子报	215
第六节	琳琅满目的报头	219
第七章	浙江县级党报发展的鼎盛时期(1999—2003)	229
第一节	浙江省记协县市党报工作委员会的诞生	230
第二节	各级领导对浙江省县级党报发展的引领	235
第三节	浙江县报探索出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244
第四节	浙江县级党报对全国县市报的贡献	250
第五节	典型报道和优秀栏目	256
第六节	强化新闻宣传管理	265
第七节	报社管理的改革	270
第八节	报业经营的创新	275

第八章 浙江县市区域报发展的新时代(2003—2011)	283
第一节 报刊整顿成为浙江县报新机遇	284
第二节 并入报业集团(市报)的县市区域报转型模式	290
第三节 县市区域报改革的新尝试	296
第四节 由县(市)委主办的报纸	302
第五节 创新发展的县级新闻传媒中心	309
第六节 县级新闻网站开启网络传播新格局	322
第七节 新媒体助推县市区域报腾飞	336
第八节 上级主管部门对县市区域报的期待	346
附 录	352
朱穆之同志在中宣部第二次县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352
浙江县市报 做大做强	董国栋 / 354
努力办好县报	湖北日报社论 / 357
毛泽东阅读《金华日报》	冯根胜 / 358
周恩来同志与《淮安日报》	秦九凤 / 361
邓小平给《盖平县报》题写报头	刘延之 / 361
为农民群众办一件好事	
——对全国第一次县报会议的回忆	陈 放 / 363
谈《诸暨报》的编排艺术	车文仪 / 364
浙江省县报历届组织机构	368
50年代创办、后来停刊未再复刊的县报一览	372
参考文献	373
后 记	375

绪 论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全省陆域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陆域面积为全国的1.06%,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人口约5400多万。下辖湖州、绍兴、温州、嘉兴、宁波、金华、衢州、舟山、杭州、台州、丽水11个省辖市;下分90个县级行政区,包括32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35个县、1个自治县。再下分为乡级行政区,截至2007年底时共有1515个,包括754个镇,457个乡(包括14个民族乡)和304个街道办事处。

浙江新闻事业起步较早,南宋时期杭州就出现了“邸报”。翻开20世纪初叶的历史,浙江省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教育发达,人文荟萃,地方报业一直比较兴盛。浙江近代的第一份报是1854年在宁波创刊的《中外新报》,第一份县域报是1897年在嘉兴平湖出现的《平湖白话报》。县域报作为一种地方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虽然因为受到政策或经济等因素影响,发展的过程跌宕起伏,走过的道路坎坷艰辛,但是,它的发展对浙江省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写好《浙江县报百年史》,不仅可以将县域报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绩及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载入史册,而且对于资政育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闻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报业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历史借鉴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好浙江省县域报的历史,对深入开展浙江新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拓展了中国报纸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国内全面系统研究地方县域报纸发展史的空白。

浙江省的县域报纸自清末产生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多次创刊,停刊,复刊,再停刊,再复刊的反复曲折的发展道路,这段历程,对当今报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本书对浙江省1897年到2011年这百年来县域报事业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翔实可靠的记录,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县域报刊的创办人、创停刊时间等史料做了考证,纠正了一些刊物的讹误。在记叙历史报刊的同时,也涉及了一些报业的经营和发展,记录、整理和考证了百年来浙江省民办、国民党办、共产党办及其他党派所创办的县域报刊的情况。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域报的发展变化,注重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在现有县报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零散的理论进行整合,在保存原有理论精华的同时,发现新的联系、新的规律,努力做出自己的阐释和解读。

全书主体部分有七个部分。

—

第一部分(第一章共四节)1897年至1937年,清末至土地革命期间,其中辛亥革命前后是浙江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县域报,对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浙江省县域报的发展,一直走在我国的前列。1897年,中国第一张县域报《平湖白话报》在平湖创办。嘉兴是浙江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经济发达,历史上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时又得风气之先,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了《平湖白话报》。该报日出一小张,由平湖人陈惟俭等创办,陈兼任经理,张文澍等佐主笔政。1898年戊戌政变后,报馆被清吏捣毁,该报停办。可惜这份报刊失存已久,具体出版多少时间不详。项士元在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中称,该报以“鼓吹革命为宗旨”。1910年,浙江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出现了一张名为《善报》的报纸,至今已经超过百年。该报为不定期刊物,毛边纸单面印8开2版。《善报》社长张天方(即张凤),主笔董閻仙。《善报》设有言论、新闻、文苑等栏目,以宣传新潮流、新思想、提倡科学为宗旨,鼓吹革新,评论时政。后因抨击时政,指责劣绅横行乡里,在1913年被当时的县公署查封。

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浙江新闻事业取得一些发展。民国初军阀统治期间,浙江报刊发展最大的特点是报纸创刊多,但报灾时有发生,多家报纸创办不久后即被查封,1913年7月24日,浙江都督朱瑞一日内查封了《天钟报》、《浙报》、《浙声》、《平民日报》和《浙江民报》5家报纸。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全国许多报刊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并促进了报刊业的新发展。五四运动及浙江的“一师风潮”激发起浙江学生和各界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起来组织政治性社团和创办报刊。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浙江各地的共产党员,办起了十几家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县域报纸有嘉兴新塍的《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杭州萧山的《责任》,绍兴的《觉悟》,上虞的《石榴报》。特别是1919年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沈雁冰(茅盾)和妻子孔德沚等人一同建立桐乡青年社,为了宣传该社的政治主张,扩大影响,决定出版不定期刊物,取名为《新乡人》,于1919年9月1日创刊,16开18页铅印。沈雁冰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诚实》一文,后又发表《骄傲》抨击社会时弊,《我们为什么读书》宣扬新的读书观。为了扩大发行量,刊物的定价较低,每份铜元5枚,在多地设立特约代售处。并在《新乡人》封面、封里和封底开辟广告栏,经营广告业务。当时该刊的广告价格是“登半页者,价洋2元;登1/4页,价1元;登4行,价半元”。来稿一经采用,不付现金,赠送刊物以作稿费。

1922年,浙江第一份农民运动报刊《责任》创刊。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萧山衙前农民暴动被镇压后,宣中华等秉承中共二大精神,留在萧山调查研究农村革命问题,组建“任社”,并以此名义出版《责任》周刊,主要刊发农民运动的文章。1922年11月27日,《责任》创刊,周刊,4开4版。《责任》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是刊发有关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文章。有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理,剖析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所载文章,更多的是在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1924年后,浙江一些县域开始出现中共党团报刊。比如,余姚进步青年郭静唐发起创办《余姚评论》半月刊,温州独立支部于1924年12月成立后即出版的《永嘉周刊》,1926年2月,中共象山支部创办《鸣报》等,内容主要是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指示精神。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许多报刊停刊,共产党人和进步报刊的办报人员被逮捕、判刑,直至被杀害。蒋介石掌握浙江政权后,视浙江为心腹地区,经济客观上获得平稳快速发展,商业报刊业也因此有了较大发展。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民党当局刚刚开始实行新闻统治,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没有公开的革命刊物出现。在浙江仍有中共组织在创办和秘密发行机关刊物。1927年5月初,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出版机关报《石榴报》,7月17日,《石榴报》遂被国民党查禁,办报人员遭通缉、抄家。同期有富阳的《晨钟》,中共缙云县委秘密编印《新缙云》等中共的报纸在秘密创办发行,但由于革命报刊出版的政治环境日趋险恶和其他原因,这些报刊不久也即停刊。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原先各县的落后闭塞状态开始被打破,各类民办报刊在县域纷纷出刊。以杭州为例,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各县创办综合性新闻报纸就有29种,仅萧山县就有10种。其中,由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等提议创办,郁养吾等共同发起,富阳县最早的一家日报《富阳日报》于1927年11月创刊,4开4版,新闻纸印刷,以“唤醒民众,宣传党化”为宗旨,登载国内外重大新闻和全县范围内的大事、要事,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反对封建专制等内容,这份报纸后来也宣传反动内容。1927年8月,《大道日报》创刊,由诸暨县农民协会创办。1927年6月21日,《民治日报》创刊,这是萧山办报之始,1927年11月,《萧山公报》创刊,1928年初,在萧山又有《萧声报》创刊,《余杭报》1927年在余杭镇创刊,建德《严报》也在1927年创刊,等等。由于各县的财力和印刷条件的限制,此时各县报纸日刊较少,三日刊和五日刊较多,开张则对开的少,4开和8开的多。

这个时期,国民党各县党部也纷纷开始办报,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在控制利用一些民办报纸的同时,陆续创办各级党政机关报刊,据《浙江新闻史》介绍,在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浙江县级党部和政府办报办刊,约为40家左右。作为控制基层舆论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地方当局对这些报刊大多有所资助。如嘉兴地区,1930年拨给各家县级党报每月大洋20元。比如国民党衢县临时党部主办的《衢声》创刊于1927年1月29日。国民党常山县党部主办的



《常山周报》1927年初创刊。由国民党嘉兴县党部宣传部主办的《嘉兴党声》1927年春创刊，等等。影响最大的是1927年4月5日的《绍兴民国日报》创刊，国民党绍兴县党部主办，先后有蔡元培、邵力子、张强等为其题写报头。1936年7月起增出《绍兴民国日报晚刊》。1941年4月绍兴沦陷后停刊。1943年5月，在会稽山游击区柳岙出油印小报。抗战胜利后回城复刊，直至1949年5月3日绍兴解放前夕停刊，历时22年。《绍兴民国日报》以阐扬三民主义、宣传政纲政策、辅助国民党工作、促成新绍兴的建设为宗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战火从东北烧到江南，直接威胁杭州，浙江各地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抗日救亡浪潮。杭州的报刊界反响也很强烈，纷纷发特刊或号外，报道沪战消息。但是，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未放松对新闻的钳制。那时候，作为新闻管理的一种严厉的也是最后的手段，就是取缔甚至封闭报馆，并且追究查办有关人员。比如，创刊于1932年元旦的《嵊新民报》，仅仅由于6月28日刊登题为《认清我们的敌人》一诗，认为是影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于是被查究并令其停刊。此外，杭州、象山等地的《指南针》、《鸣报》、《午报》、《民生月刊》等等，均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被一一扼杀。仅在1936年和1937年两年内，浙江全省被查禁的报纸、杂志共约100余种。

二

第二部分(第二章共六节)，1937年至1945年，为抗日战争期间。这一时期的县域报主要宣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8年间，浙江各地创办了121家报刊。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战前创办的一些报纸，不论国民党办的还是民办的，这时也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调。比如，国民党办的《东南日报》在1937年8月即派出战地记者，刊发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颂扬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报道，报纸面貌为之一新。但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新闻管制和对进步报人的迫害，致使许多报刊相继停刊，不少编辑记者被捕，其中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主任计惜英被送进上饶集中营。

抗战时期，一些省报和地市报纷纷搬迁到县域内继续办报和发行。还有一大批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浙江各地涌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浙东、浙南、浙北的抗日根据地，也办起了10多份报纸。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撤退到金华地区的永康方岩，省府部门、军事机构、群众团体随之纷纷在金华落户。从沦陷区撤出的大批抗日志士和进步文人、学生也来此找到安身之处，他们组建流动剧团、服务团、歌咏队、宣传队，开办书店和出版社。战时云集金华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其中有林默涵、巴金、夏衍、冯雪峰、张乐平、曹聚仁、薛暮桥、艾青、胡愈之、范长江、杨朔、沈从文等。来金的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

金华创办各种报刊,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文化活动,竭力宣传全民抗战。《东南日报》、《正报》等迁至金华出版。此后,又有诸多抗日报刊陆续迁入金华或在金华创刊。原在杭州刊行的《战时生活》、《中国儿童时报》,此时也已迁金华出版。鉴于金华北能通苏浙皖敌占区,南可达闽赣粤桂大后方,连外省一些期刊也都纷至沓来,如南昌的《青年团结》(中共东南局青年部主办)、衡阳的《士兵周报》、汉口的《前敌周报》。另有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周刊》,也在此发行金华航空版。当时在金华等地出版的还有《战旗》、《前线》、《啸报》、《游击》、《野战》、《突击》、《进攻》以及《抗日民报》、《先锋日报》、《战时消息》、《战时大众》等。至1942年5月,在那里出版发行的报刊已有62种之多。金华成为全国抗日战争后方三大文化宣传中心之一。1938年2月24日《浙江潮》创办之后,各种报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有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后改名《抗建论坛》)、《东南战线》和《青年团结》,以及《新青年》、《浙江妇女》、《战地》、《台湾先锋》等等。这些报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激发全省军民的抗战热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曾一定程度上左右过浙江舆论的,是《东南日报》和1941年3月12日创刊的前《浙江日报》。

《东南日报》,原为《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1934年6月改名《东南日报》,标榜“党的立场,自由色彩”,发行遍及浙、苏、闽、沪,最高发行量曾达4万多份。抗战期间迁至金华、丽水、江山等地。《东南日报》是浙江解放前诸多报纸中,坚持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日报之一。其间,先后出过金华、南平(福建)、丽水、云和诸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先是恢复杭州版,旋又出版上海版。

《浙江潮》,1938年2月24日在金华创刊。《浙江潮》为综合性时政刊物,16开旬刊,第7期后曾改周刊,第90期起复出旬刊。这份打着省主席黄绍竑旗号,名为浙江省政府主办,实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控制的时政性旬刊,发行量曾超过10万份。并以“沟通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为己任,大量发表杜国庠、骆耕漠、邵荃麟、陈虞荪、石西民、何家槐等著名进步人士的文章,宣传团结抗日方针,竭力推动《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实现。1939年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视察金华时,曾单独接见《浙江潮》的发行人兼主编严北溟,给以鼓励,并面授机宜。1941年3月12日,即在《浙江潮》停刊两个月后,前《浙江日报》创刊于永康县岭张村。前《浙江日报》对外宣称是“独立经营的民办报纸”,实则是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支持下筹办起来的报纸,社长兼发行人是原《浙江潮》负责人严北溟。该报从开始筹备起,就得到中共地方组织的支持,报社里建有中共地下党支部,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了报社的采编工作。他们通过巧妙的改写,不断刊登来自延安的战讯;利用副刊,经常编发歌颂团结抗日文稿,受到广大民众的厚爱,报纸发行量一度突破3万份。因日军侵扰,报社从永康岭张村向浙南山区撤退,途中一度停刊。后虽在丽水的碧湖复刊,然因迁徙逃难,人员器材流散,碧湖又僻处山岙,报纸销数减少,而更大的困难是政治压力越来越大。1944年5月,日寇步步进逼,报社再南迁至龙泉,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1945年9月20日迁至杭州出版。前《浙江日报》出至1947年4月30日停刊。

1938年12月,浙西行署由绍兴迁至西天目山,临安成为浙西抗日前线的指挥中心。这时,临安(含当时的於潜县、昌化县)有各种抗日报刊近20种。影响较大的有《民族日报》、《浙西日报》、《於潜导报》、《扫荡简报》等。《浙西日报》以省讯快为最,《民族日报》以观点鲜明见长,《扫荡简报》因战讯翔实得到读者信赖,《於潜导报》因版面活泼、内容丰富被誉为“浙江小报之王”。当时的《民族日报》虽名为浙西行署领导,实则创办初期即为中共浙江文委所掌控,在报社建有中共地下党支部。该报记者经常出入游击区或者敌后采访和发行,即便是日伪统治最严密的上海、杭州地区,有时人们还可以看到《民族日报》;而《浙西日报》的发行范围,一度曾远达四川重庆。

抗战期间,日伪也曾在浙江沦陷区办过6种报纸。报上除媚日反华反共报道和言论外,就是无聊的社会新闻和宣传色情的文艺作品,格调低下,读者不多。不少报贩将摊到的当天报纸成捆卖给废品店。

三

第三部分(第三章共两节),1945年至1949年,为解放战争期间。这一时期的县域报迎来了浙江乃至全国的解放。浙江的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5年秋,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战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就在新闻阵地上展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抢先在收复区扩展他们的新闻阵地。在湖州,他们接管了日伪《湖州新报》的资产后当即创办《湖州青年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浙江各市县的党部、政府、军队和三青团等机构,又创办了《南雷日报》、《扫荡报》、《正义报》、《新生日报》、《安吉民报》、《定海日报》、《寿昌报》等24种报纸。

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江报刊业在抗战后期下滑后出现了复苏势头,并曾形成一个办报小高潮。据统计,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年多时间,全省新创办和延续出版的各种报纸近百家,其中,大多为民办报纸。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浙江民营新闻传媒业,每况愈下,由兴而衰,有些报社、通讯社只生存几个月或几天。到共和国成立前夕,除国民党浙江地方党政当局所办报纸外,全省民办报纸由近百家锐减为不足20家。民营新闻传媒业一时间蜂拥而起,不久即如雪崩似的倒塌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时局动荡,经济凋敝,大都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门歇业。二是国民党的打压和迫害。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大肆抢占新闻阵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要求各地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历史条件,迅速地在当地创办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扩展到收复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浙南特委率先于1947年5月1日在瑞安创办了《浙南周报》。随后,到1949年,中共四明工委、金萧工委、椒南工委、浙东临委又先后创办了《四明简讯》、《浙东简讯》、《路东简讯》、《新路南报》、《金萧报》等8份报纸。这些报纸,迅速地向收复区民众报道人民军队在东北、



华北、中原等解放战争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及时揭穿国民党统治集团散布的一个又一个谣传与谎言,为解放战争在浙江的最后胜利凝聚了民心。

四

第四部分(第四章共七节)1949年至1962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县级党报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为了迅速传播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及时转达党中央的声音,全省各地党委、军管会曾独自或合作创办4开小报,这些新创办的小型报纸,内容全是或大都是新华通讯社电讯。如1949年5月11日创刊的《龙游新华简报》,日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龙游县军管会主办,登载新华社消息和评论,8开单面,土白纸铅印,发行500份,免费发送机关、学校、商店(8月30日停刊)。这些小报,虽然基本上只刊登新华社讯,刊行时间也比较短,有的仅出版几个月,各报期发量2000—4000份左右,但不失为浙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崛起初期的一朵朵闪亮的浪花,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随着全省各地陆续解放,在接管和改造旧有报纸的同时,新型的人民报纸先后出现在浙江大地上,逐步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江社会主义报业体系。

1949年5月9日,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于杭州解放后的第6天创刊。5月12日,温州地区党委在《浙南周报》基础上改刊创办的《浙南日报》正式出版,对开4版,首期按《浙南周报》编号顺序为94号。出刊第二天,头版“读者与编者”栏即刊文阐述党报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人民报纸人民办”,并明确提出:“有事大家商量,有意见大家讨论,有困难大家解决”,“要与读者群众紧密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是浙江省第一家地市级党报。1949年6月1日,中共宁波地委办的《宁波新华电讯》创刊,8月8日,《甬江日报》创刊。11月1日,中共丽水地委机关报《工农大众》创刊,12月1日,《金华大众》和《衢州大众》等相继与读者见面。1953年1月1日《台州大众》创刊,1955年1月1日《嘉兴大众》、《建德大众》创刊、1955年3月1日《舟山报》创刊,1955年11月1日,《杭州日报》创刊。

20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的经济和社会渐趋稳定。为适应当时农业合作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全省出现解放后第一个办报高潮,其特点之一,是各县党委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办报。从此,以《浙江日报》为“龙头”,在全省范围形成省、地(市)、县三级党委机关报网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胜利后到50年代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浙江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1953年,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特别是在1955年10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村,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与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作斗争,就要向长期单家独户生产的个体农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为此,必须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社

会主义新闻事业担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历史使命。

1954年6月,出现了浙江省第一家县报《临海报》,后来郭沫若还亲自为《临海日报》题写报名。影响最大的,是1954年12月11日杭州市萧山县创办的《萧山报》。这是杭州地区第一家党委机关报,早于1955年11月1日创办的《杭州日报》;也是全省第二家县级党报。创刊时,《萧山报》为8开2版,五日刊;1956年1月1日,改为三日刊;创刊时期报纸用活字直排印刷、字体用5号繁体字。版面安排是:第一版为重要新闻,第二版为农业、工业、财贸、文艺、政法的新闻报道,辟有各种专栏,诸如《最近国内外大事》、《时事综述》、《萧山各地》、《党的生活》、《农村俱乐部》、《农民技术常识》、《卫生常识》和《读报人来信》等。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迅猛发展,广大农村迫切需要适合农业发展新形势的报刊指导工作,加之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创办报刊提供了一定的财力,于是,各县先后办起了报纸。这一年,全省先后有《慈溪报》、《杭县报》等8家县报出版发行,加上原来中共建德地委机关报《建德大众》,一共9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1955年7月16日创刊的《吴兴报》。《吴兴报》为当时中共吴兴县委机关报,创刊初为4开2版,五日刊,不久改4开4版,周三刊。195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报刊评介”专栏发表文章《介绍一个县报——吴兴报》,表扬了这张报纸,在浙江省的县报中,这是首例获得《人民日报》表扬的报纸。1958年5月,更名为《吴兴日报》,创刊时发行量6500份。

1955年底,浙江省的县级党报已经发展到10家,加上《建德大众》,共11家。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和中宣部打了报告,要求在全省各县办报。1956年2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对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和中宣部的报告,作出批示,同意全省61个县,于年内办起县报。省委将要求办报的县分为三批,第一批应于5月1日前出刊。并且具体规定:县报一律为8开2版,目前以五日刊为宜;县委应当指定一名书记或常委,直接领导报纸工作;县报主编,应由县委委员或区委书记一级的党员干部担任,并应列席县委常委会议和县委全体会议;五日刊编制为3~4人。随后,全省各地便积极行动起来,县报如同雨后春笋,在全省各地纷纷创刊。1956年创办的县报达到65家。另据《浙江省情概要》的数据:到了1956年底,浙江全省当时共81个县,有县报75家。

1956年全省各县普遍创办了县委机关报,各县报在创刊初期,大多是五日刊,有的只有2个版,有的只有8开,刚开办不久,就觉得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于是,就出现了一股增期扩版与改刊为日报的现象。增期,就是缩短报纸的刊期,把创刊时的周刊、五日刊,增为三日刊、隔日刊;扩版,有的是把原先的二个版,扩为四个版;有的,是把原先的8开版,扩为4开版。许多报纸在经过这一步骤,具备一定条件后,改刊为县级日报。这种现象从1956年开始,到“大跃进”年代,则是在全省遍地开花。1957年至1959年期间,在“大跃进”的锣声中,不仅大部分县有了党报,而且许多大县在原来每周几刊报的基础上,办起了县级日报。比如,1954年创刊的《萧山报》,创刊时为8开2版,五日刊。1956年1月1日起,《萧山报》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仍为8开2版。报面文字由竖排改为横排。1956年4月1日起,《萧

山报》实际出版刊期由三日刊改为隔日刊。1957年12月,中共萧山县委作出《关于萧山报扩版的决定》,经宁波地委(当时萧山属宁波地委管辖)批准,于1958年元旦起扩版,由8开三日刊改为4开三日刊(4开2版)。1958年元旦至4月,《萧山报》扩为4开4版,三日刊。1958年4月8日,《萧山报》从三日刊改成隔日刊。1958年6月1日起,将《萧山报》由现在的4开隔日刊改为《萧山日报》。

《上虞报》,创刊初期为8开2版五日刊,1958年1月改周三报;5月,改4开隔日报。1958年7月4日更名《上虞日报》。同年11月,版面扩大为4开4版。发行2万份左右。《永康报》、《淳安报》、《象山报》等二十余家县报改为日报。

当时的“跃进”实际上是“冒进”,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出现了严重失误。在一些地方,办报还处于长官意志、行政命令的状况。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连学生的课本用纸都是又黄又糙,根本无法提供报纸用纸。加上当时的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县报渐渐失去了支撑,最终因经受不住经济衰退的打击而于60年代初期陆续下马。县报先后开始停刊。1961年底,县报基本都已经停办了。这个时期的县报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报业有鲜明的行政色彩,报业构建基本与国家行政等级相匹配,没有运用市场机制,办报经费主要靠行政拨款,报纸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虽然这个时期县域报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激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一些宣传作用。

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浙江省内基本没有县报。

“文革”期间,社会上乱象丛生,各县报业处于无序状态,省、地级党报等正规报纸被夺权或停刊,浙江的不少县里,当地“造反派”组织、“保皇派”组织、各种红卫兵组织、其他基层单位和个人组织出于鼓动“文革”的需要,出了各种各样的小报,开始多为油印,不定期出版,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分发,有的也向社会发行。此类小报多数以鼓动“造反”为宗旨,跟着“中央文革”煽风点火。还有一些非正式组织的人群,既借助上游庞杂的小报信息,又利用下游猎奇的群众心态,经过摘编包装,拼凑成一份“报刊文摘”,以赢利为目标,混迹于“小报交易”市场。这些报纸往往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经常刊登一些小道消息混淆视听,小报泛滥成灾,时间不长陆续停刊。以上这些报纸都没有经过党委和政府的审批。

“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浙江省内基本没有县报。

五

第五部分(第五章至第六章共11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县级党报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这个阶段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神州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浙江县级党报广泛开展了宣传三